# 荆楚长歌

## 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精华

山西博物院　湖北省博物馆　编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精华 / 山西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编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8
ISBN 978-7-203-07414-4

Ⅰ.①荆… Ⅱ.①山… ②湖… Ⅲ.①战国墓—出土文物—湖北省—楚国（？～前223） Ⅳ.①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450号

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精华

| | |
|---|---|
| 编　　著 | 山西博物院　湖北省博物馆 |
| 责任编辑 | 刘小玲 |
| 装帧设计 | 后司视觉 |
| 出 版 者 |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
| 地　　址 |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
| 邮　　编 | 030012 |
| 发行营销 |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
| |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
| E-mail | sxskcb@163.com 发行部 |
| | sxskcb@126.com 总编室 |
| 网　　址 | www.sxskcb.com |
| 经 销 者 |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
| 承 印 者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mm×1194mm 1/16 |
| 印　　张 | 10.5 |
| 字　　数 | 100千字 |
| 印　　数 | 1-1500册 |
| 版　　次 | 2011年8月 第1版 |
| 印　　次 | 2011年8月 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03-07414-4 |
| 定　　价 | 160.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荆楚長歌

## 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

山西博物院　湖北省博物馆 编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致　辞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辉煌而动荡的时期。西周传统的宗法社会受到冲击，政治上，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经济上，公田转向私田；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产生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而儒家、道家等流派不但开创了当时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也奠定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通过21世纪初在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楚墓文物以展现这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是礼乐制度，用来维系社会的等级和教化；“戎”是军事征伐，即以暴力手段镇压邦国内外的动乱和反叛。礼乐和征伐互为补充，形成天下认同的“王道”。无礼乐，征伐师出无名；无征伐，则礼坏乐崩。随着社会的进步，以维护礼乐制度的王道战争逐渐被诸侯兼并的争霸战争取代。楚国是在争霸战争中兼并列国最多、控制疆域最广、技术最为发达、文化极其昌盛的国家。

楚早先是族名，后为国名。楚人起源于荆山山脉，立国有800年。楚人早先筚路蓝缕，土地不过百里左右，到战国时期已是地方五千里、战车千乘、甲兵百万的强国。其兴盛的原因在于楚人既尊周礼，也保留蛮夷作风。楚在政治上灭其国而立郡县，军事上挟甲兵之势兼擅舟兵野战，文化上兼包并容、亦夷亦夏，故能以夷夏之长兼并60余诸侯国，控制了包括今天川、陕、湘、鄂、豫、赣、皖、苏、浙、鲁、贵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势力扩展到了云南、广西和广东，客观上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在礼制的规范和诸侯争霸的背景下，楚国的贵族墓葬体现出了“祀与戎”的特点，湖北枣阳九连墩一、二号楚墓就是典型的代表。

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为配合湖北省孝感至襄樊高速公路的建设，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九连墩古墓群的1、2号墓及陪葬的1、2号车马坑进行了发掘，其中1号墓出土文物4000余件（套），2号墓出土随葬文物1000余件（套）。1号车马坑清理出随葬车辆33乘，马72匹；2号坑清理出随葬车7乘，马16匹。经研究，两座墓葬为夫妻异穴合葬墓，1号墓主为楚国大夫，下葬于战国中晚期。2号墓的下葬年代稍晚于1号墓。两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礼乐器和兵器，如钟、磬、鼓、琴、瑟、笙、竽、篪、柷等乐器90余件，是历年楚墓出土乐器最多的一次。一号墓随葬有戈、矛、铩、殳、戟、剑、盾、甲、胄，仅青铜剑就随葬28把，是楚墓出土青铜剑最多的一次。二号墓主人虽为女性亦随葬大量兵器。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祀与戎”的时代见证。

湖北是楚国故地，湖北省博物馆是楚文物收藏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应山西博物院的邀请，湖北省博物馆以九连墩出土文物139件（套），在太原举办“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这是两馆首次携手合作。我相信，这一精彩展览不仅为太原的广大观众提供了一场难得的文化盛宴，也将进一步促进两馆之间的合作交流。

祝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　包东波

2011年8月

# 致　辞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政权，从1038年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灭亡，延续了近190年，创造了辉煌的功业和灿烂的文化。然而，后世的中国史家不仅未给这个王朝建立史册，而且相关正史中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使其逐渐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直到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佛经、文献和文物，西夏文化才引起世人的关注。

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西夏王国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西夏文字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为西夏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亦成为今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陶瓷器、金、银、铜、铁器，绢、锦纺织品和木器等丰富多彩的工艺品，是党项族在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融合北方游牧民族浓郁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亮彩；星罗棋布的佛塔寺庙，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榆林窟，精彩传神的佛教雕塑、风格独特的佛教绘画，数量浩瀚的佛教文献，无不体现了西夏佛教文化神秘而又有地域性、多元而又不失民族性的特色，使其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建筑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汉唐建筑的传统与技艺，也注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形成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西夏建筑风格……这种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西夏文化，是党项、汉族、吐蕃、藏族、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彼此影响、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一种多来源、多层次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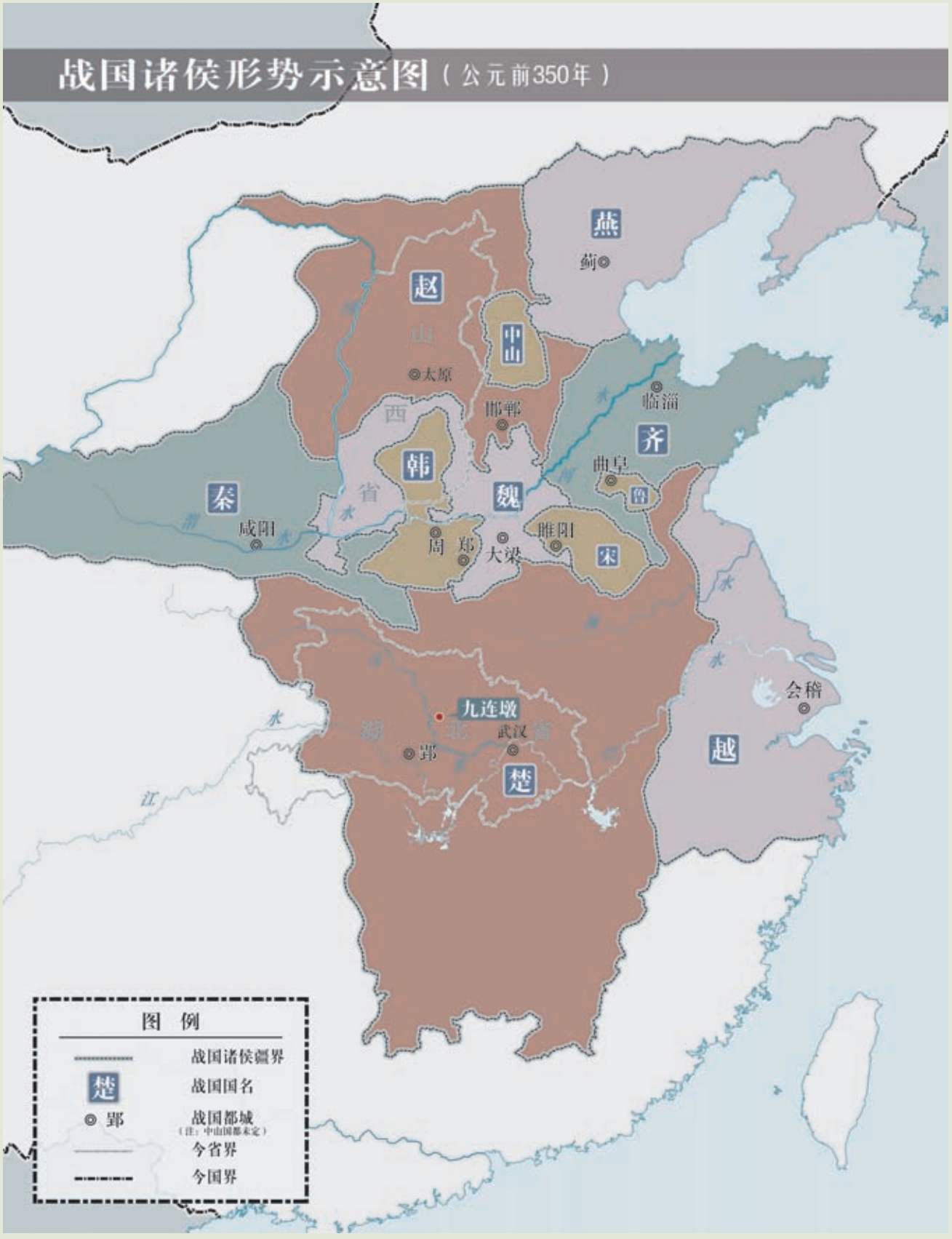
今天，凝聚了西夏人智慧和才干、展示西夏文化独特魅力的130余件精品文物来到了山西博物院，通过西夏文字、西夏工艺、西夏佛教、西夏建筑四个部分，向观众再现了一个马背民族的文明。

“大夏遗珍——西夏文物精品展”是山西博物院引进的第一个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展览。感谢宁夏博物馆和李进增馆长，为山西人民提供了如此绚丽精美的展品。相信这次展览将有助于社会公众进一步认识西夏，从中汲取文化力量，携手共建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美好明天。

谨祝“大夏遗珍——西夏文物精品展”圆满成功！

山西博物院 院长 石金鸣

2011年8月


战国诸侯形势示意图（公元前350年）
燕
蓟
赵
中山
太原
邯郸
临淄
齐
韩
曲阜
魏
秦
咸阳
周
郑
大梁
睢阳
宋
九连墩
武汉
郢
楚
越
会稽
图 例
战国诸侯疆界
战国国名
战国都城
（注：中山国都未定）
今省界
今国界

# 目　录

Ⅰ　◎致　辞　包东波

Ⅱ　◎致　辞　石金鸣

001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王纪潮

010　◎九连墩的发掘　胡雅丽

021　◎九连墩1、2号墓出土的乐器　张　翔

028　◎九连墩文物新探　张吟午

037　◎前　言

039　◎铸鼎象物

077　◎比德于玉

095　◎漆木华彩

127　◎坚甲利兵

151　◎结　语

#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 ——“祀与戎”背景下的楚国文化

王纪潮

周代是以血缘亲疏划分贵族等级秩序的宗法社会，只有始祖的嫡长子方可继承天子的权力，是为大宗。其余诸子封侯，相对于周天子，他们是小宗。诸侯的嫡长子亦继承诸侯的权位为大宗，诸侯之庶子封为大夫又为小宗，其余等级的贵族依此类推，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1]的社会等级秩序。周王朝又以“王畿”为中心，分封与周王同姓的诸侯国，如晋、随（曾）、黄、蔡、卫等，分封少数的异姓诸侯国如姜姓的齐、芈姓的楚以及一些臣服的诸侯，如子姓的宋、姒姓的杞等。国君封爵也按照血缘亲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周代的异姓封国都不大（如楚受封子爵，地仅百里左右），以确保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以血缘亲疏关系确定贵族等级秩序的制度设计是希望以此防止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维护王朝的稳定。由于宗法制度的权力主要来源是大宗，因此祭祀祖宗、鬼神和上帝就有宣示贵族身份、权力来源合法的意义和神圣性。周代也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以维系社会的等级和教化，同时以武力保证王道的实行，其社会特点简言之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重大变化，这就是诸侯势力的兴起而周王室权力的削弱，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其间楚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楚早先是族名，后为国名。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说自己是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的后裔。在出土的楚简中，楚人祭祀的祖先有老童、祝融、鬻熊等。从楚贵族墓葬的人骨鉴定材料看，楚贵族不是江汉地区的原住民，而是北方中原人种。[4]楚人的直系祖先是祝融氏。祝融氏分为八姓，其中季连这一支与西方部族联姻后独立出来称为“芈”姓，也是楚宗族的姓氏，时间约在夏商之间。商末周初，楚人首领鬻熊率部居于丹阳（约在今河南淅川、湖北丹江一带），楚人进入信史时代。在周成王时，楚熊绎受子爵，以“楚”为国名。“楚”有在山林建国之意。到周夷王时，楚人进入江汉地区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楚国君熊渠也以蛮夷自居，不奉周室号令，楚人开始走向自强发展之路。在礼乐制度上，楚人既尊周礼又有创新；在军事上，楚人观兵于周疆，问鼎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先后兼并60余诸侯国，成为“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5]的超级强国，客观上促成了秦朝的统一。

此次“荆楚长歌”展览，由2002年在湖北枣阳九连墩1、2号楚墓出土文物中的精华部分构成，基本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楚国的文化风貌，以下结合部分文

物从礼乐制度和兼并战争两方面简述楚国的文化。

## 礼乐制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发掘了大量的楚人文化遗存，目前科学发掘楚墓的总数已超过10000座，占到东周时期墓葬的70%，楚城址也发掘十几座，为研究楚国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楚墓出土的文物有青铜礼乐器、车马兵器、生活器具、服饰用品和简帛文书等。其中墓葬规模宏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是2002年发掘的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两座墓葬级别为大夫墓，墓主人身份为夫妇，一共出土文物5333件套，绝大多数与楚国的礼乐制度有关。

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祭祀祖先、鬼神和上帝。《礼记·曲礼下》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这段记载说明了三点：1.宗庙祭祀、祭器优先；2.祭器具有身份性；3. 宗庙、祭器与居室、养器（日常用具）有明确界限。同时，周礼还对不同身份的贵族以“鼎制”（使用正鼎的数量）和“乐悬”（悬挂钟磬的列数）予以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天子宫悬（四面悬乐器），诸侯轩悬（三面悬乐器），大夫判悬（两面悬乐器），士特悬（一面悬乐器）。这些礼乐器依据在现实世界或地下世界的使用情况被分为祭器（人器）与明器（鬼器），[6]无论是祭器还是明器，均是贵族身份和礼的体现。



九连墩1号墓的34件编钟

楚人宗族来源于北方，其文化属性为中原文化，因久居江汉地区，其礼制尤其是核心的鼎制有所变化，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其礼乐制度与周礼系统基本一致。[7]

考古材料发现楚高级贵族按照周制使用奇数鼎列，均以正鼎为中心形成食器、酒器、水器的组合形式。楚鼎制基本同于中原，但略有三点区别：1.中原常见的鼎簋、鼎豆组合，演变为鼎、簠、缶和鼎、敦、壶的两套礼器组合；[8]2.楚高级贵族完全按周制使用奇数鼎列，但中下层贵族采用偶数鼎，礼器（鼎、敦、壶）的组合也成偶数；3.代表贵族身份的正鼎（升鼎）与中原的圆腹寰底鼎不同，采用了平底束腰形式。九连墩1、2号墓分别随葬以鼎为中心的礼器三套（其中2号墓有一套漆礼器），其中1号墓为青铜5件升鼎，4件簋；2号墓为漆木升鼎5件，簋4件，与中原贵族随葬奇数鼎一致，只是鼎的形制有异。[9]另外，1、2号墓均出土了编钟、编磬，合于周礼判悬之制。据测音显示：1号墓的34件编钟、12件甬钟为明器没有调律痕迹，两组钮钟22件，有部分调律；2号墓11件钮钟依全部调律，其正鼓音音列也明显与中原传统有关。[10]

周礼规定，鼎皆有俎，故与鼎制相配合的还有俎制，俎制也为奇数。从已发掘的湖北当阳赵家湖春秋楚墓、河南信阳长台观1号战国墓、湖南长沙浏城桥战国楚墓、湖北荆门包山2号战国楚墓、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及九连墩楚墓随葬的俎来看，楚国高级贵族用俎与中原一致，均为奇数。[11]如先秦俎制中还有一种正视成H形的俎，即房俎，通常一墓一件。《礼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郑玄在《诗·鲁颂·閟宫》“笾豆大房”中笺注：“大房，玉饰俎也。”楚高级贵族墓葬也常见这种镶嵌玉、石的房俎，河南信阳1号楚墓、包山2号楚墓、九连墩1、2号墓各出土一件。又如周礼“始死之礼”的程序中有饭含之礼，规定贵族含以玉。以往楚墓少见玉琀，在九连墩2号墓墓主口中，玉琀清晰可见。[12]周礼的沃盥礼是祭祀、祭奠的必需环节。其程序是以匜盛水，盘承弃水。具体到丧礼，以罍盛水，勺挹水，洗盛弃水。盥礼之器为楚墓常见，只是楚器的名称稍异，如盘称“盥盘”、罍自名为“盥




九连墩2号墓墓主口琀



九连墩1、2号墓出土的方鉴缶



九连墩1、2号墓出土的圆鉴缶

缶”。九连墩楚墓有完整的盥礼用器出土。

先秦社会的礼乐器是人们社会关系和意识的体现，不同的时代，礼乐器的器型、器类、组合和使用方式都会有所变化。商代青铜礼器以酒器为中心，强调的是人与神的沟通；周代青铜礼器以食器为优先，反映的是贵族的现实身份。由于祖先和神明是宗法制度的权力来源所在，祭器中的酒器在彰显身份之外，更多地体现了人与神明的关系，也因此是周代礼器组合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九连墩楚墓中，酒器数量仅次于食器，出土类别有盉、尊、壶、缶、鉴缶、杯等，包括了战国时期的主要酒器类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2号墓各出土了两套鉴缶（冰鉴），1号墓为方鉴、方缶；2号墓为圆鉴、圆缶，鉴缶器形与墓主性别相关。冰鉴是装水的鉴和装酒的壶或缶之组合。缶置于鉴中，鉴与缶之间的空隙可盛冰。《周礼·天官·凌人》云：“祭祀共冰鉴。”祭祀用冰鉴是因为祭祀用酒为未经蒸馏的发酵酒容易变酸，使得无法祭享，冰冻则可保持酒的清醇。九连墩楚墓之冰鉴，正是祭祀的重要酒器。以往楚墓出土的鉴缶因保存情况不佳或扰乱，是否为冰鉴组合不明，九连墩出土的鉴缶提供了难得的考古样本。

先秦礼乐制度夏商周各有不同，周王室与诸侯列国也不尽相同，但“器以藏礼”，用礼乐器区别尊卑贵贱的规则始终不变。因此，礼乐器作为制度、权力和身份的符号，并不会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采用的形式、数量以及组合方式的局部变化而改变它的基本意义。从九连墩楚墓出土礼乐器的整体上看，礼乐器虽有个别器形、器类和礼器组合的变化，这不影响我们对楚国礼乐制度的文化属性基本遵从周礼之判断。也因此可以确定，楚国文化的大传统或者说主流文化是中原文化。

## 兼并战争

周代以礼乐制度体现和维系社会的等级秩序，以武力征伐镇压邦国的反叛动乱。西周王室衰落之后，礼乐征伐由诸侯掌控，遂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国从土不过百里的小国一跃成为地方千里、带甲百万，最后统一中国南方的大国，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制度层面亦夷亦夏，赢得广泛支持；二是立国方略尚武好战，以兼并战争扩充势力范围。楚康王（公元前540—前529年）曾对令尹子庚（即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说，五年不出兵征伐，就是忘掉先君之业。[13]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基本就是围绕楚国争霸中原、中原联军抗楚而展开。它包括南北战线的晋楚战争和东西战线的吴楚战争。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集中在以楚国为中心的六国合纵抗秦。楚国军事力量也就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得到壮大。荀子曾评论楚国的军力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钜铁鉇，惨如蜂虿；轻利僄速，卒如飘风。”[14]

楚国争霸中原战争从楚文王十一年（公元前679年，齐桓公称霸）到楚康王十一年（公元前546年，宋国的向戌召集诸侯弭兵大会），其中宋楚泓之战（公元前638年）、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邲之战（公元前597年）和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4次重大战争奠定了楚国的霸主地位。中原列国以晋为首组成联军。楚或联秦，或联齐，双方基本是势均力敌。战场在郑、卫、许、陈、蔡、宋、江、蓼、六、舒等国进行，即今天河南的中部、东部，山东西南和安徽、江苏的北部。从楚共王六年（公元前584年）吴国兴起，到楚怀王（公元前328—前299年）二十三年（公元前306 年）楚灭越，[13]楚国的军事中心渐转向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这时的楚境东接齐鲁、西邻强秦，战线漫长。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后，楚郢都迁到安徽寿县。新的秦楚边境无险可言，楚人的商丘、上蔡至桐柏防线与秦东郡（原魏地）、颍川郡（原韩地）、南郡（原楚地）毗邻，防线后面均属开阔平原。楚境内河流上游的淆河、惠济河——涡河、贾鲁河、汝河——颍河已在秦境，季节干燥时可步涉。秦灭楚之战开始之后，楚军在王翦壁垒战术下无功而退，被秦军追击引起平原上的大逃窜。公元前223年楚都寿春旋被攻克，楚亡。

楚人由兼并战争而强，其政治制度也为军政合一，政府首长令尹就是最高军事长官。楚国采用征兵制，士兵来源早先只国人，因战争规模扩大，最后扩大到野人（无当兵权之人），形成举国皆兵。楚国兵制分车兵、徒兵（步兵）和甲士，军备由国家征收民间赋税承担。楚国贵族亦保留有私兵，作战时也编入战斗序列。

楚人对北方作战以车战为主。20世纪80年代之前，仅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和安



九连墩1号车马坑

徽淮阳等地发现有大型车马坑，而湖北境内尽管楚国车马器出土很多却很少发现战车。过去认为，原因可能在于战国时期楚人车战随着步战、野战流行，车战就逐渐衰退。随着宜城罗岗（1989）、湖北江陵九店（1989）、枝江姚家岗（1987）、丹江吉家院（1999）以及2010年在荆门严昌先后发掘了战国中后期的车马坑，尤其是九连墩1、2号车马坑分别出土33辆车、72匹马和7辆车、16匹马，创下中国考古发掘的车马坑出土车马之最，可知车战大致贯穿楚国争霸的整个时期，在战国后期楚国车战也仍居重要地位。目前所知楚国车名就有20种之多，亦是先秦之最。其中可以确定为战车的有“大市（旆）”、“乘軨”、“軨轩”、“蠪车”（九连墩一号车马坑27、29、31号车）、“正车”、“韦车”等。[16]

综合考古和文献材料，楚国战术编制大概有三种：1.战车编阵，推测有4车、2车成纵列的6车阵式和成“品”字形的4车阵式；[17]2.以战车为中心辅以步兵的混合编阵。每辆战车配备步兵的人数不断增加，战国时多至100余人；3.散兵。楚国战车一般由两马驾驭，车厢面积长宽为123厘米～165厘米和76厘米～98厘米之间，可容3人。车厢外壁装有铜甲、皮甲，车上有插挂各种兵器的贮放筒和挂件。车战时，需用长柲兵器，如长柲的戈、矛、殳、晋殳、戟等方能制敌，这些长柲兵器九连墩楚墓均有出土，不仅数量多、种类齐全还有不少新样式，其中一件长柲铜铩值得重视。铜铩是铜剑加装长柲而成。剑的兴起与步战流行有关，但以剑加柲构成长兵器之铩，应是车战采用步战兵器尝试。

孙子曾言“车甲之奉，日费千金”。从九连墩楚国战车的装备来看，其耗费不赀。墓主下葬年代接近秦人破郢的公元前278年，可以想见在战国晚期楚国仍维持庞大车甲对其经济有巨大的的破坏作用。



九连墩战车漆皮甲



铜铩　通长43厘米、宽5厘米，九连墩1号墓出土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总的趋势是车战逐渐被步战、野战代替，步兵的作用日益突出。楚国是较早使用独立步兵的国家。楚共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70年），楚军进入吴越地区作战，楚将邓廖就率领组甲300、被练3000为前锋。文献所称“组甲”、“被练”是步兵，但具体形制不详。从考古材料来看，楚国甲兵大致是以皮革为甲，髹漆后再以丝麻编联制成。楚高级贵族墓中都发现有甲胄，比较完整的有如荆门包山2号墓、江陵望山1号墓、江陵藤店1号墓、长沙浏城桥1号墓等，一般1副或2副甲，而九连墩1号墓一次清理出28副甲，为历年楚墓出土之最。经整理研究，它们有7种类型，还包括有秦式甲。[18]

此外，湖北地区的楚墓出土大量的短兵器如剑、匕首和射远武器弓、弩等，这些是





九连墩1号墓出土弩上的田猎图

步兵的最佳装备。九连墩1号墓一次出土28副甲、28把青铜剑，正好一甲一剑。楚人最先发明了弩，它是用于近身肉搏和突袭的利器。目前发现完整的弩都出土于楚墓。1987年在江陵秦家嘴47号墓发现了一具完整的20支双矢连发的弩。[19]九连墩1号墓一次出土两件漆绘弩，亦反映出墓主对新型弩兵的重视。

## 结语

“荆楚长歌”所展示的文物虽然出土自楚大夫一级的墓葬，但是器类包括有青铜、漆木、玉器、竹简，既有礼乐制度规范的祭器、养器和明器，也有仪仗兵器、车马器；既有反映日常生活的用器，也有隐含楚人精神风貌的艺术品，概括性地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化特色，有许多文物是首次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数据。

以往楚文化的研究强调楚国文化的特殊性，认为楚国礼乐制度自行其是，意识形态信巫好鬼。实际上，制度变迁和信巫好鬼是任何文化都有的现象。从九连墩楚墓的青铜礼乐器来看，它们基本上遵循了周礼，其鼎制、乐制和乐律体系一如中原。又比如楚贵族墓葬常见一种虎座鸟架鼓，被人视为楚人崇凤欺虎的象征，而九连墩楚墓新发现了龙座鸟架鼓，是否就是楚人崇凤欺龙呢？可见对楚国的艺术图像和楚人的思维不能以现代理性来解读。随着近些年来九连墩楚墓等一系列楚墓的考古发现，考古界对楚国文化的认识已趋于一致，楚国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大传统是中原文化，小传统则保存南方地域性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尽管出现礼坏乐崩、诸侯混战，但敬天法祖、敬畏神明、追求社稷和一已之福的仪式并没有消失，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换了形式。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混乱所带来的文化融合开启了秦汉大一统之门，具有多种文化因素的楚国文物恰好可以作为注脚。



漆木龙座飞鸟

[1] 《左传 · 桓公二年》。

[2] 《左传 · 成公三年》。

[3] 《论语·季氏》。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山楚墓》，41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22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5] 《史记·苏秦列传》卷69。

[6] 《礼记·檀弓上》云：“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亦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礼记·檀弓下》：“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周人兼用明器、鬼器，孔子不赞成“用生者之器”为明器，这已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在变化。

[7] 高崇文：《楚国丧葬礼仪制度概述》，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208页，合肥：黄山书社，2003。

[8] 中原、楚地礼器对照表：

| 时期 | 中原 | 楚地 |
|---|---|---|
| 春秋早期 | 鼎簋壶盘 | 鼎簋簠壶盘 |
| 春秋中期 | 鼎簋舟盘 | 鼎簠缶盘 |
| 春秋晚期 | 鼎簋（豆）罍盘 | 鼎簠缶（敦）盘 |
| 战国早期 | 鼎豆壶盘 | 鼎簠敦壶盘 |
| 战国中期 | 鼎敦壶盘 | 鼎敦壶盘 |
| 战国晚期 | 鼎敦壶 | 鼎盒壶盘 |

[9] 王红星：《九连墩一二号楚墓用鼎制度研究》，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47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7。

[10] 张翔：《九连墩1、2号墓出土的乐器》，参见本图录专文。

[11] 高崇文：《楚器使用礼制考》，见《楚文化论集》第四集，10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张吟午：《战国时期楚国高级贵族墓用俎管见》，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55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7。

[12] 九连墩2号墓女主人随葬器物有不少北方风格，如镬鼎、弄器等，其族属未必是楚人，故饭含或为中原葬俗。

[13] 《左传·襄公十八年》。

[14] 《荀子·议兵》。

[15] 楚灭越时间尚有公元前334、307、306、305年等多说，史记取公元前333年。

[16] 萧圣中：《楚简车名汇释》，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175～183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7] 黄文新：《试论楚国车马阵容》，同上，页582。

[18] 王先福：《九连墩1号楚墓人甲的复原与初步认识》，同上，484页。

[19] 陈耀均：《江陵楚墓出土双矢并射连发弩的研究》，载《文物》，1990（5）。

# 九连墩的发掘

胡雅丽

九连墩是一个长不过4公里、宽不过0.5公里，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冈。其分别隶属湖北省襄樊枣阳市的吴店镇东赵湖村与兴隆镇乌金村，位于枣阳境内的中部偏东处，是大洪山余脉延伸出来的一条南北向低冈。冈地基岩为白垩纪第三系紫红色砂岩，原生土为第四纪黄褐土母质发育形成的山冈土壤，地势北高南低，海拔高程在110米至136米之间。滚河自东向西流经冈地以南约1公里处，至襄阳境内注入汉水。其西、南两面地势开阔平坦，属河畈地区，现为水稻等农作物种植区。

在2002年的最后几天，九连墩借助传媒的力量，一夜之间名噪海内外。四面八方的人们，不顾天寒地冻，不管阴雨连绵，不怕泥泞满道，纷纷寻访而来，为的只是一睹它的芳容。九连墩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魅力，引得骄傲的媒体对它眷顾有佳？它的名字何以如符咒一般，吸引着那么多人的眼光？

## 一　九连墩的历史与传说

由《枣阳志》我们可以获悉，枣阳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西周、春秋时期为曾国所辖，至迟在战国早期即被楚国占领，秦、汉时期属南阳郡，隋朝始称枣阳县。也就是说，枣阳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九连墩是其时空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连墩墓地远景

站在九连墩冈地南边向北远眺，可见九座隆起的土堆由北至南巍然耸立在冈脊上，连绵起伏达3公里余，当地俗称“九连墩”，墓地因此而名。[1]

相传古时有位大官被皇帝错杀，甄别平反后，赐得金头一个随葬。为防盗墓取金头，一夜间修了九个大冢，以惑真假。

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在自然冈地上人为地筑有土堆，即有可能是古墓的封土堆，而封土堆的规模如此之大，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其可能是较为重要的古代高级贵族墓地。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我国的文物保护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对大型古墓葬，一般是以保护为主，不提倡主动发掘。因此，尽管九连墩墓地在1958年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时即已发现，1984年又被列为襄樊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还升级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没有